

“全球化与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经济的转型学术研讨会”综述

邵彦涛 熊昌锟

传统经济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经济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而探讨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演变,需要我们在全球化视野下,进一步将目光投放到中国传统经济的转型进程当中。为了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2017年10月13日至15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在武汉联合举办了“全球化与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经济的转型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机构的60余位学者,围绕着传统经济转型、工业发展、经济史的理论与方法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一、中国传统经济转型的意义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高速发展期,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古代辉煌的中国、近现代衰落的中国与当代崛起的中国,构成了3张截然不同又似曾相识的面孔,吸引无数学者一探究竟。彭南生指出,探讨全球化与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经济的转型体现了身处工业社会的当代人的学术自觉性,同时也是从“发生学”意义上探寻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历史原点,直接关系到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本质特征的科学定位。魏明孔则称经济转型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全球化背景下探讨中国传统经济的转型,更具有典型意义。当前中国的学术研究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学者们的不懈努力,才能更好发展。

李伯重以全球史的视野对江南经济的近代转型进行了分析,提出江南长期而且成功的斯密增长,为以库兹涅茨增长为核心的近代经济转型做了更好的准备。李玉指出,近代中国的演进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其中的表现之一就是各种“速度”不断加快,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加速”样态,商业化大潮于是有了可能与基础。

二、传统手工业的转型研究

虞和平从宏观的角度对民国时期的手工业发展脉络及其转型过程进行了梳理,全面反映了近代中国手工业的代谢过程。彭南生、李庆宇探讨了世界人造丝业的兴起对华丝国际市场的影响,进而指出竞争力的缺乏是导致华丝在市场上处于劣势的关键。李德英分析了以女性为主体的乡村手工业与市场产生联系的方式,并对女性手工业者在市场体系中所处的地位进行了探讨。孟玲洲则以1927年为界点分析了前后两个时期京津地毯业的发展变迁,认为市场格局深刻影响着地毯行业制度的选择。

熊元彬指出洋纱与鸦片在云贵高原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是由特殊的历史和产棉甚少却需大量棉料的云贵经济地理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李中庆认为抗战前的“桐油危机”实际上是被社会舆论、

[作者简介] 邵彦涛,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武汉,430079,邮箱 shaoyt04@mail.ccnu.edu.cn。熊昌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836,邮箱:xckhistory@163.com。

政府和桐油商人共同营造出来,进而演变成为各方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工具。

梁娜、卢厚杰详细梳理了在引进技术设备过程中,企业自主经营权的变化对技术引进的影响。邵彦涛以明清以来兰州毛纺织业的发展为例,指出机器工业的兴起并非近代中国手工业衰落的核心因素,技术差异也并非影响手工业和机器工业发展的关键要素。陈鹏飞论述了卢作孚移植江南地区的制度、推广江南蚕丝业的技术以挽救四川蚕丝业危机的重要史实。

三、行业史的转型研究

陈争平、云妍探讨了全球化潮流冲击下中国传统经济的大转型进程,认为这一转型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薛毅指出,晚清时期中国出现了使用机器生产的煤矿,推动了铁路、电力等近代工业和煤炭城市的出现和发展。王荣华以 1941 年 6 月开工的大兴面粉厂为中心,探讨了战时内迁工业与后方经济的融合与发展。汪谦干认为“面粉大王”孙麟方的一生对国家、对社会都有很大贡献,对提高华人在马来西亚的影响力也有积极作用。

吴景平指出上海华商金融业与日伪当局进行了折冲交涉,与背弃民族立场、祸国害民的汉奸有本质的不同。刘志英认为重庆传统金融业的现代转型并非移植、嫁接西方的模式,而是一个融合了现代与传统、内源与外源合力作用的过程。黄正林认为民国时期陕西关中的“金融进村”不仅部分解决了关中农村金融枯竭的问题,还使关中农村有了现代化的气息。刘俊峰以 20 世纪 30 年代的“废两改元”“法币改革”为背景,讨论了南京政府时期基层商会在地方金融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熊昌锟认为近代中国并无真正的货币本位,银本位直到 1933 年“废两改元”才得以实现。魏晓锴认为,山西票号的衰败和消失,根本上是由“利润负增长”所决定的,与祁太平金融市场的兴衰密切相关。张徐乐对民国时期上海钱业改制过程中的长期辩论进行了讨论。

王京滨分析了永利化学股份公司在不同发展过程中的融资结构,探讨了企业在外部资金约束下的金融创新模式。严斌林梳理了大中华纱厂不断增股、终致资金断链而被迫变卖的历程,认为这是近代中国民族纺织企业资金短缺及市场环境恶化的集中体现。

燕红忠认为近代日本对华货币政策的演变一方面使得中国货币行用状况趋于复杂,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连贯性,严重影响到其经济侵略的效果。马陵合分析了外债与国内资本市场的关系,指出国内资本形成能力直接影响外债效应。田牛通过分析清末币种购买力,指出财权离散的货币反应用于中国的近代化产生了反作用。张杨对川西地区的 3 次减租运动进行了梳理,并对国民党和共产党解决主佃关系的举措进行了对比分析。周倩倩认为,新中国时期的盐业缉私被赋予了浓重的时代和政治色彩,以“运动”促生产的做法深刻影响了盐业缉私的方式。程利英认为,新中国经济恢复时期采取的“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平衡了财政收支,保障了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李欢考察了民国时期山西的教育,认为山西省政府以财政大力支持教育,对个人和社会都产生了溢出效应。

杨红伟对近代西北市场中的羊毛和粮食贸易进行了考察,厘定了近代西北市场的某些历史事实。张玮、熊亚平探讨了华北平原市镇和集市空间形态的变化,并提出了市镇集市相对发展曲率的概念。李虎对泰山香社组织中的经济因素进行了分析,对研究明清、民国时期底层民众的生活提供了参考。庄蕊蕊以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上海电影业的商业广告宣传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了电影营销宣传与市民消费意识间的相互形塑影响。

谭备战、孔素芳指出,无线电管理处通过对外国在华无线电事业的整理,逐渐收回了无线电的国家主权。李晓英、庞俊义对甘肃驿运机关采取的“旧工具之新利用”、以“时间换空间”、“半工半义务”等营运机制进行了讨论和分析。温艳认为抗战时期成为甘肃农田水利发展的高峰,得益于国民政府把农田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及国家银行加大了对水利的投资。

四、当代经济的转型研究

武力、孙钦梅通过对 65 年间产业结构变迁过程的梳理,认为中国的产业结构还处于中低端水平,还需要抓住新工业革命方兴未艾的机遇期,加快实现向中高端转型升级。徐有威、周升起对近五年来三线建设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提出应在加强资料收集与整理、增加比较研究、丰富研究理论等方面进行努力。焦建华、郭玉婷运用计量方法对 1950—1990 年间福建侨汇变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认为当时侨汇并无投机性,而国内政治运动造成的饥荒等使得侨汇数量大幅减少。严鹏、陈文佳梳理了福州市二轻工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手工业的工业化趋向,认为这一趋向主要是由政府推动,但也具有内在的经济合理性。王玉贵指出落实私有住房政策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私有产权观念的确立,缓解了十分紧张的社会矛盾。柳作林对湖北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程进行了梳理。胡宏根以河北饶阳县五公村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例,探讨了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戚昱明以黄县地区为个案,对 1949—1953 年间当地渔业管理体系的建立及在此过程中当地渔区的变革进行了探讨。

五、工业文化发展研究

朱荫贵指出近代中国工商企业文化是在传统中国工商业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被赋予了“爱国、强国、商战、团结、科学、创新、市场拼搏”等要素。张忠民认为近代中国工业化发展路径包含了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国有工业与民营工业之间的比重、行业分工、政策扶持等问题及互相之间的关系,二是工业产业结构中重化工业与轻纺工业之间的关系。王翔讨论了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振兴蚕丝生产、改善国际贸易的方案,梳理了最初厉行以“信义”为基础的商业活动演变为引进欧洲的生产方式、改造蚕丝业的历程。

六、经济史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王玉茹从经济史研究现状的评述和未来发展的视角,探讨了经济史学人如何在中国经济学理论构建中担当起应承之责的重要角色。李金铮对冀中尤其是华北平原雇佣关系进行了解析,并指出这一地区雇佣关系的特征是基于生态环境、地权分配和经营方式的合力所形成的。林枫对卜凯调查进行了深入分析,展示了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东南乡村生活的可能情景,并在此基础上对前人农村研究问题做了申论和思考。王莹、常旭梳理了利用旧海关史料研究的学术成果,重新审视了经济统计思想与方法在百余年中传播、应用的历史。

总之,在本次会议上,学者们对于近代中国传统经济转型的各个领域均有涉及,相关研究均立足于档案等原始史料,也借助于经济学等理论和方法,卓有新意。一些学者对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的史料学和理论基础进行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探讨。所有这些,都为提炼面向世界的中国话语体系,解答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厘清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思路,提供了思想资源。

(责任编辑:黄英伟)